

传播学百科文库·传播思想史论系列
戴元光◎主编

Chuanbo Xueke de Dianding
1922 ~ 1949

传播学科的奠定 1922 ~ 1949

胡翼青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传播学百科文库·传播思想史论系列

主编：戴元光

传播学科的奠定： 1922 ~ 1949

胡翼青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000-8790-8

I. ①传… II. ①胡… III. ①传播学—历史—世界—1922~1949

IV. ①G206-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6958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于淑敏 李 晓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82千字

印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8790-8

定 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朱晓华

丛书总序

《传播学百科文库》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设计的、反映当代传播学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的高水平的理论研究丛书，作者主要是近年来活跃在传播学研究前沿的青年学人，也有年长的学者，以及名不经传的新秀。入选丛书的专著主要标准是“新”；或者是话题虽老，但观点“新”；或者话题新，观点也新；或者新人新作，或者研究空白点。

收入丛书的 15 本著作，主要为两个系列：传播思想史论系列主要话题是对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的最新研究专著，不乏新论，其中西方学人研究是对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的系统研究。这些学者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又对传播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传播学前沿理论系列主要研究视野是当前的关注点，主要是对中国相关学科的研究。

传播学科可能是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最年轻的学科，西方的研究不过百年，中国的研究近 40 年，但传播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却是任何学科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包括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媒介对人的影响，媒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已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媒介对文化的解构与建构，媒介对社会的解构与建构，媒介对人的价值的解构与建构，也已经是现实，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一个人的学术生命（研究生命）约 35 年，而我们之所以用三四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套丛书，和传播学在中国的命运有关。

传播学从西洋传来近 40 年，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引入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生态，指示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路径。但我们又不无遗憾：一方面，中国传播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有很大差距，与国际水平有很大差距。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传播学研究整体上比西方落后，整体上处于介绍西方传播学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传播学理论于实践的阶段。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当落后，以宣传代替新闻传播，公信力低；传媒政策及媒介经营理念滞后；媒介结构单一，制度供应不足；资源整合能力低，融资途径不足；面临国际国内多重冲击与压力，面对因社会发展、互联网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体意识消解、社会信任危机、公共观念淡薄等新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新文化价值建构；非理性的娱乐化倾向在膨胀；传媒呈现贵族化精英化趋势。

本丛书尊重学术研究规律，坚持学术自由的宗旨，力采争鸣与探索、批评与反批评的向度，因为探索、争鸣、批评是走向真理的桥梁。

在丛书出版时，我写了以上的文字，爰充为序，以求教于方家。

戴元光

2011 年初秋于上海

序

学科与问题

黄旦

近些年，我自己对于传播研究的历史有过些粗浅思考，几年来所上的一门博士生课程，亦是与此有关，但迄今为止，仍是觉得其牵涉面太广，功力不逮，似有所知又不能真正深入堂奥，说出点能切中肯綮的意见。因此，看到胡翼青现在的这本书，心里很是高兴，因为它不仅对于美国传播学科形成的来龙去脉做了深入的解读，并且对一些我们耳熟能详但又时时萦绕于心的问题，比如：美国传播学“在人们的观念中为什么会被描绘为以四大奠基人为起点的实证主义效果研究”，它“为什么必须是‘五W’框架和以效果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为什么只是实证主义才代表这一学科的最高研究水平”，“为什么总是具有行政研究和保守主义的价值立场，常常可以自然而然地作为美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科学’工具”，等等，从不同角度予以解疑答惑，给人多有启发。

自然，这本书所展示的不可能是美国传播学科形成的唯一历史真相或者什么客观规律，充其量不过为胡翼青的一家之言。如果说历史的描述总是和个人知识、经验和理论修为相关，那么，这里面的材料是否扎实，叙述是否合理，阐释是否有据，观点是否得当，各人自可评判，其结果也不难预料，必然是见仁见智。仅就我个人而言，更中意的尚不是这本书的某个观点，而是其整个思考方式，即不是就学科谈学科，而是于一个横断面切进去，从诸种并存的问题空间及其关系中来，探究一个学科是如何因此浮出水面，并且是

以这样的面貌，这很与我的旨趣和思路相投。

美国学者费希尔认为，“史学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学科。某个人（或任何人）若提出一个关于过去事件的无预定答案的问题，并按照解释范式的形式来安排挑选出来的事实，以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是一个历史学家。”^① 这话说得不错，尤其是在个人治学的层面。倘放大了看，似乎应该倒过来：是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学科，学科本就是为解决问题而产生而存在。依照沃勒斯坦的描画，学科是现代性——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由于法国大革命带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三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随后成为世界观——就应运而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应对此种变化并做出解释。然而，意识形态属于政治层面，政治议程尽管重要，但它们需要对当前现实情况有具体的了解。“简而言之，它们需要社会科学。人如果不知道世界是如何运作的，那么让他建议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使世界运作得更好是很困难的。”由此，与资本主义变动相关密切的市场、国家和个人的领域成为注目对象，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得以承认。随之，历史学——了解过去发生什么从而理解当今变动——也得以命名。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研究共同感受到的变动，尤其是与自己国家相关的问题，成为它们的共同特征。^② 然而，当学科成为大学分制的结构性依据，并且以传承知识培育专业人才为主要目标时，解决问题似乎只是学术研究——学科某一部分的功能，学科本身则被认为是一种巍然屹立的知识和教育体系，它因脱离烟尘不言自明而受到供奉。学科建设的含义，除了在学科内部变换花样、分化组合、叠床架屋，自我循环式创造出诸种“某某学”，以争资源、争项目、争地位之外，其本来所具的与现实及其变动的根须，要解决现实问题的主旨和取向，则被一刀切断。当然，就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及其现状而言，此种做法能够理解。加上我国现代教育

^① 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49页。

^② 华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刘琦岩、叶萌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5-19页。

是在现代转型中成建制引自国外，对于学科及其知识的来源更加隔膜，自也是情理之中。也正是因此，我们讨论学科，大多都是在知识体系和结构设置层面，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系统拿来，不关注其背后的历史和现实渊源。当学科的繁荣或发展是以外延的扩展，所谓二级、三级学科的多少为依据时，离学科的本意也就越来越远。至今被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我国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其预设亦不乏这样的痕迹。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批评其所谓系统了解实际上就是了解“系统”——传播学被想象成一个知识系统，学者们的大量精力是在出产或洋或土的教材而不是研究的展开和深入。现在看来这个批评还没有完全到点上，更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把传播学兴起与沃勒斯坦指出的“现实变动”的关系抛掉了。在这样光秃秃一穷二白语境中，美国的传播研究和中国的传播研究完全被设想成是一个轴心依次而下，无论是批判还是自主，都跳不出这个被了解的“系统”。由此来看，胡翼青这本书的意义，还并不在于他对那些具体人和事件的辨析，尽管这样的辨析很重要而且也不乏精彩之处，而是把美国传播学科置于其时的“变动”——各种问题中来考察，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有些论述可以商榷（比如：施拉姆究竟该如何评价？我总觉得，一个人的主观动机、政治身份、学术水平、构建学科的功绩，以及所带来的影响等，是需要仔细分辨，不可由此及彼，一概而论）但这样的思路不能不加以充分肯定和赞赏，尤其在当前的中国，当前中国的传播研究。

与上述的构想相关，在全书的结构上，胡翼青打破传统史学以时间和因果为线的叙述方式，而是以人物为点，以不同时空为经纬，来编织美国传播学动态的历史图像。任何叙述策略都是与自己试图要表达的内容相关，胡翼青的这种处理方式，既聪明也很成功。他借此避开枝节，把焦点对准几个主要连锁点，浓笔深描，同时以此辐射开来，把不同环节上的东西一并收进，很好地完成了自己要勾勒美国传播学科创立的“过程瞬间”的既定目标。必须指出，这种貌似技巧的运用，实蕴含着学术认知和取向的变化，按胡翼青自己

的表白，是试图走知识社会学的路径，与过去的研究有所不同。如果把他这本书和他此前的《再度发言》做一比较，其变化是一目了然。当然，变化不等于价值，与书的质量也未必成正比。这里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治学，不断尝试对自己的过去有所突破，是非常之困难。这不仅需要积累，需要学养，需要勇气，更需要自知之明。正因为深切体会其中的不易，我对于胡翼青的有意识“尝新”，也就更为赞赏。假如“无招胜有招”，是一个学者渴望而又难及的目标，那么，通过不断学习操练各种招式，扩大自己的视界，提升自己的学术创造力，感悟其中的学术和生命真谛，必然就是我们的实际学术历程。否则，即便活着，即便著作等身，价值意义暂且不论，实在也是无趣得紧。

在导论中，胡翼青开宗明义，表明自己有价值立场，不愿像曼海姆那样，把意识形态中立化。在书中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书中处处显露出他自己的辨析，并且锋芒毕露。但是，我总还是有点不过瘾。因为批判是需要武器的，在“刀、斧、剑、戟”的兵器库中他究竟取的是什麼，依循何种“兵法”，似仍不甚了了，致使辨析的锋利多于理论批判的深度。俗话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矛”与“盾”总是相连，理论批判武器不清，怕也与“盾”——批判对象未能进一步聚焦有关。比如：书中到底指向什么传播学科，中国人想象的，是书中提到的这些学者在不同面向上各自努力自然形成的，还是施拉姆、罗杰斯之类通过自己著述向我们展示的？矛头所对的是传播学科形成的基本前提，是在诸种必然或偶然因素中美国传播学科制度化后的面貌，抑或是其先天不足从而为传播学科带来的消极甚至负面后果？如以拍照为例，现在让人的感觉似乎是长焦广角都有了，焦点反倒显得有点漫漶。若有进一步的凝聚，相信书中所展示的理论意义会更加突出，对我们的启发也会更大，其扫视的眼光和最终的结论，也就不只是停留在普遍意义上的学科困境和两难。

我曾经不止一次用“基础渐厚”来表述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看到有一批像胡翼青这样的年轻学者，

正在学术园地崭露头角，一招一式，出手不凡。因此，很期望他们这一代牢牢抓住中国的问题，以自己每一个扎实的研究，来推动中国传播学科在整体上的大飞跃。

一说到“代”字，我也就明白自己老之将至，胡言乱语而不自知，怕也是势所难免。这个序，不过因循入俗，完成这个我好像没有理由推却的任务，读者们姑妄听之，无需当真，还是以自己的判断为准。

导读：我们从美国传播学科史 研究中读到什么？

王怡红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少有人怀疑这门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一些海外归国讲学的传播学者使用“传播研究”替代“传播学”的观念悄然流行，做法不胫而走。近年来，随着传播研究的深入和传播学科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中国传播学界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方面，反对学科的立场，质疑传播学的合法性，在学术会议和论文中更多使用“传播研究”，以表现其科学性，突出知识立场和批判意识，传播学科的身份认同出现了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大学和相关科研机构抛开了传播学研究与学科教育对知识积累、研究领域、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师资状况的要求与标准，对传播学科肆意安置定位，涉及了多个领域，如新闻传播学、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网络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造成了一种学科繁荣的假象。这使得有关学科问题的混乱变得愈发醒目了。

然而，将“学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不是要解决学科本身。学科并非真正的问题之所在，相反倒是一门特殊知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其说上述现象表现为学科问题，不如说显露为传播研究与学科化的冲突问题，包括人们对学科设立有无要求和标准的问题。如果说前者还带有规避学科化的自觉抵抗，那么后者却显露为

一门知识体系的学科化扩张。我们知道，知识的积累是由多条道路组成的，传播学的复数发展是无法回避甚至不能加以歧视的事实。但通过这种快捷方式以增加学科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隐藏在这些思路背后的知识危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并非切断与传播学科本身的联系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取决于身在中国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所担负的对西方传播学科的批判研究和所投射到中国传播学术中的问题意识有多么强烈。虽然我们对学科化进行了抵抗，对学科价值进行了逻辑推演，但由于没有真正回应那些与传播学科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搭配而来的“知识”、“制度”、“意识形态”和“个人名利”等问题，没有回应传播学知识的积累到底在为谁服务的问题，这种单纯抵抗的姿态和给学科定位的随意性做法，对推进传播学的进步依然作用甚微，甚至危害更大。

虽然上述的自相矛盾是学科存在的不争事实，但对传播学科发展将产生不良后果和妨害。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重新理解传播学科发展史，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建立起对学科化行为的“纠错能力”，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必须肯定的前进方向。学科史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批判和反思学科化的机会。只有反思清楚了，才能知道怎样与学科问题打交道，如何做才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在这种语境下，读胡翼青的《美国传播学科的奠定》一书，会为我们更有力地反对学科化倾向，倡导传播学科知识的进步，提供更多的理由和思想准备。

一、对学科化的历史反思

胡翼青选择接近历史的途径带有锋芒的批判视角，这几乎是他一贯的治学风格和知识立场。自2004年出版《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以来，他始终专注于传播学科及学术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2007年，他又出版了《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以重新解读和审视一个重要学派的方式，系统研究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传播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在那本著作中，他以30多万字的长篇发言，牵出了芝加哥学派这条历史线索，让我们有机会

较完整地认识传播学的起源与学术发展的真实状态。这本《美国传播学科的奠定》仍旧保持了他对西方传播学知识生产模式及其生产者之间内在张力的敏感性。他站在知识社会学的批判立场上，深入探究传播学科思想史书写背后的社会动因，通过找回那些看似偶然但却被断然拒绝的历史线索，对学科化问题进行了反思质疑和重新考量。

在这本书里，胡翼青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不在于重新描述一门学科始于何处，而是追问为什么传播学科的书写会从这里起源和发端。他的批判动机旨在说明学科意识和理论偏见对一门学科发展的阻碍作用，揭露那些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始终占据领导地位的学术话语体系对传播研究进步的损害。如果我们时常反感一种批判性研究，那么胡翼青对批判思想的使用并非因为批判更有力量，只有通过批判才能获得了对问题的理解，而是基于他对传播学已有问题的看法。这是我对胡翼青惯于使用批判性思维来看待传播研究的一点认识。

胡翼青认为，“以韦尔伯·施拉姆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科史的书写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这一学科现有知识体系的认同感，阻碍了理论创新，因此理论创新的问题必须转化为一个重新书写历史的问题。要打开一个学科神话的狭窄边界，就必须重新书写传播学科的思想史，因为一切神话都有它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历史。”出于这种认识前提，他很乐意把占据传播学科的主要理论与四大奠基人及施拉姆本人的历史都变成知识社会学批判的对象，把他的叛逆性和批判矛头始终指向以施拉姆等人为代表所创立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学科神话”。

尽管施拉姆本人一再反对把传播研究作为封闭的学科，他始终强调传播研究的跨学科性。1959年时他是这样判断的：构成传播学的知识领域具有跨学科性质，因此不能称其为一个学科，而是一个

研究领域。^① 20 多年后，他的看法依旧未加以改变。他认为，已有的传播学术机构和传播项目没必要在大学的建构中固定下来。相反可能还会被更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吸纳。^② 但施拉姆的这种表态除了加剧学科知识立场问题的复杂性之外，并没有对阻止学科进程产生什么实际意义。相反，倒是施拉姆时常被他人誉为“传播研究之父”，^③ 1997 年，美国《传播学史》作者罗杰斯和查菲共同编辑出版了施拉姆发表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篇文章《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他们以此为书名，不仅收录了这篇文章，而且还通过续写美国传播研究开端的历史，将传播研究“奠基人”的称号授予给施拉姆，以彰显施拉姆在这门学科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④ 在中国传播学界，施拉姆更是著名的“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这对一贯坚持传播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而非打造“学科围墙”的施拉姆而言，无疑是种极具讽刺意味的评价。应该说，施拉姆对传播学科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包括与施拉姆自己创造的“传播研究四大奠基人神话”相比，这些都已成为事实。这种状况除了有知识向学科自身演化的逻辑，有学术传承者乐意接过施拉姆的“火炬”继续高举的原因外，还有施拉姆等人书写传播研究的历史时，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一些构成学科的标准有关。他们书写历史的方式及叙事立场，选择的权威人物和清点的理论遗产，被回避的知识结构与现实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都无法让他们装作自己与传播研究的学科化进程无关。今天中国的传播学要跟上形势的变化，追求市场化和对策化的研究，包括教科书的知识传承已经固定化，忽视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缺

① Wilbur Schramm, Devid Riesman, Reymand Bauer,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ents*, in: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spring 1959, P. 8.

② Wilbur. Schramm,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Dan. Nimmo, *Communication Yearbook 4, An Annual Review*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80, P. 82.

③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bur_Schramm.

④ Wilbur. Schramm,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ersonal Memoir*, Edited by Steven H. Chaffee and Everett M. Roger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7.

少方法创新的需要等问题，也与施拉姆等人没有正面给予界定的学科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影响发生关联。若想戳破这层非直观的学科化面纱，阅读由胡翼青重构的传播学科思想叙事，辅以施拉姆的“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这篇文章作为认识学科现象的分析文本，对批判地理解知识传统，理解传播学的意义和价值，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施拉姆的这篇文章最早收在1980年由国际传播学会出版的年度综述《传播年鉴4》一书中，作为传播教学的一份参考资料。在这篇文章中，施拉姆很清楚地表述了他选择传播研究四大奠基人的主要标准。施拉姆首先提到了早期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运用社会学科视角研究传播的问题。库利于1909年就发表了《社会组织》一书。该书对传播过程进行了敏锐的分析，但施拉姆并没选择库利作为传播研究的开创者，也没有选择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及的其他学科知名学者，如李普曼、萨皮尔、沃夫、皮尔斯、维纳、香农等十几位对传播研究也有重要贡献的人。按照施拉姆自己的说法，库利等人的传播研究属于“访客”性质。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贡献，但他们只是这个研究领域里的过客。为进一步说明“过客”的性质与“定居者”不同，施拉姆还把传播研究早期历史比作人类在5000年前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被称为Bab Elh - Dhra的小村庄。由于位于约旦的Bab Elh - Dhra这片沙漠地带的水质很出名，因此一些游牧民经常在此停留。公元前3000年左右，农业发展开始取代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于是有人来此安居，生活了几千年，后来为人类历史所遗忘。他以这座在死海东岸发现的青铜时代的一个小小古城为寓言，象征库利等人虽然运用本学科方法研究传播问题，算是许多年前曾经到过这里，在这里驻过足，但这些人没有定居下来而又继续前行，关注各自领域的问题去了。对于这块领域只是近年来才有学者长久居住，乐以传播研究为学术家园。拉扎斯菲尔德四人正是脱离了他们原来所在学科，像迁入并定居在这个无人之地的先驱者一样，开始了他们的传播研究，并对这一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

影响。因此“他们无一不有理由成为著名的美国传播研究领域之父”。^①

运用简单的“过客”和“定居者”的寓言替换其学术位置，降低其学术影响力，这种选择策略似乎有些可疑，在学术史书写中也不算高明。让这些人作为烘托明月的几颗稀疏暗淡的星光，更有失学术立场的公正。但施拉姆的立场是鲜明的。他在题记里特别强调这四位奠基人都是对建立学术机构和开拓传播项目有所贡献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一些学者能在这些机构里专职从事传播研究，也正是这些特殊的学术贡献，他们才应该有资格享有“传播奠基之父”的称号。^② 其实，“研究领域”与“学科”只有一步之差。但这“一步之差”该如何衡量是个问题。若以“创建学术机构”和“开拓传播研究项目”为标准来确定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以这些内容书写传播学术史，那么“研究领域”与“传播学科”的差别就很难分得清楚。即使我们知道施拉姆反对将传播研究变成一个封闭的学科，也不等于施拉姆真正找到将传播研究表述为一个领域的有效方式。相反他是完全按照学科的标准选择了奠基人并书写了这段传播研究的历史。这并不等于建立了区分二者不同的标准。可以说，这难免使人们会对他开始就反对将传播研究学科化，最终自己却被学科化的结果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我们注意到施拉姆最终选择了拉斯韦尔等人而不是库利和帕克等人，那么他使用多大篇幅，从哪个角度来书写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职位，他所强调的四大奠基人对解决传播研究问题的主要贡献，就可以明白施拉姆为什么采取这种策略书写历史。施拉姆的选择取决于他对历史的理解，取决于他对传播研究与社会关系的

① Wilbur. Schramm,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Dan. Nimmo, *Communication Yearbook 4, An Annual Review*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80, P. 73.

② Wilbur. Schramm,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Dan. Nimmo, *Communication Yearbook 4, An Annual Review*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80, P. 73.